



文化中国行

秦文化的甘肃印记

璀璨夺目的早期秦文化,有文物做证。大量具有秦韵之风的文物,经过考古人员的发掘清理以及有关部门的征集和追寻,大部分重现于世。这些文物是中华民族浩瀚历史的物证,也让我们得以看见嬴秦早期历史闪光的一页。本期让我们跟着文物跨越时空,感知早期嬴秦文明的历史脉络。



交龙纹榑方壶



螭端纹青铜卣、兽首青铜觥



鸂鸟形金饰片(右为镂空形)



秦公陵园出土的
龙纹繁组秦公钟

在大堡子山寻找嬴秦早期文明印记

□ 本报特约撰稿人 祝中熹

秦的溯源

秦人本为东夷集团嬴姓的一支,其始祖可追溯到东夷集团鸟图腾部族首领少昊,和五帝之一的高阳氏颛顼。秦人有世系可寻的远祖大费,就是佐禹治水的伯益。嬴秦的母体是在华夏文明形成过程中作出过卓越贡献的部族。嬴秦在何时、为何而西迁至甘肃西部,学界尚有不同认识,但至迟在商后期,嬴秦已在西汉水上游建立了一个以西邑为中心的小方国,先是依附于商,商亡后又臣属于周。

西垂本名“西”,因曾长期被犬戎族占据,故又名犬丘或西犬丘,是秦汉时陇西郡著名的西县县治所在,也是诸葛亮北伐初出祁山,因街亭受挫仓促撤兵时顺手“拔”掉的西城,其地望大致在今礼县东部永兴与祁山之间。由南北流的西和河(古建安水)在此与由东西流的西汉水交汇,形成了一片土壤肥美的小盆地。西端是坡缓而临水的塬子山,东端是以盛产井盐而名著于史的盐官镇(古卤城)。域内气候温润,川地开阔,农畜两宜,是古代部族建邦立邑的理想地带。西垂地区处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交界处,东依秦岭,西望岷山,是关陇与巴蜀、汉中的交通枢纽,也是联系、控制西部戎狄的战略要地。

嬴秦以世代相继的辛勤劳动,开发、繁荣了这片河谷川原,也为保卫它付出过血的代价。从这里出发,嬴秦披荆斩棘,奋勇拼搏,开拓了一条走向关中、走向中原,最后统一神州大地的胜利之路。

鸂鸟形金饰片

因受山坡地形的限制,大堡子山秦公陵园的范围并不大,东西长约250米,南北宽约140米,中心部位由北到南(也即由上而下)平行并列着两座大墓。北面一座为目字形(M3),南面一座为中字形(M2)。中字形大墓以南,附有一东一西

两座车马坑,已清理的是东面一座(M1)。周围有规律地分布着200多座中、小型墓葬。所有墓葬均坐西朝东。从大墓形制和出土器物、铭文内容,联系古文书记载考查,可知陵园的时代属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。多数学者认为,两座大墓的墓主应为秦襄公和秦文公。随葬器物除一部分被国内文博机构收藏外,部分已流散世界各地。

陵园所出金器,数量最大的一批曾在巴黎展出,并在伦敦出版过图录,包括一对金虎和大量金饰片。其中鸂鸟形饰片4对8件,高52厘米,宽32厘米。另有小型饰片34件,分口唇纹羽瓣形、云纹圭形、兽面纹盾形、目云纹窃曲形等类型,高度在7.5厘米至20.3厘米间,宽度在3.8厘米至18.5厘米间。

在出土的金饰片中,有一对鸂鸟形饰片最为精美,其造型为钩喙,环目,挺胸,屈爪,满饰不规则的凹凸勾云纹,亦像翎毛。其中一件随纹样走势在图案空白中镂出10处形状各异的透孔,推测当初孔中可能有镶嵌物。这种大型金鸂片是成对的,镂空镶嵌可能意在显示雌雄之别。器表残存涂过朱砂的痕迹,器周沿较均匀地分布着9组因附棺椁而留下的双眼钉孔。

甘肃省博物馆收藏的众多金饰片中,有一件羽瓣形饰片,高11.7厘米,宽8.65厘米,略呈长方形,一短边圆角,中部三角形外突。片内饰两组并列的口唇形重环纹,片上残存朱砂痕迹。另一端为直角,两角部位有不规则的小洞眼,应是附棺椁的钉孔。只在一端有钉孔,可能当时只固定金片的上端,而这留钉孔的上端则被其上一排金片所叠压,若干同类金片呈鳞瓦状排列,它们应是金鸂鸟的翼、尾之羽饰。片上的口唇形纹样是对羽瓣的一种象征性艺术描绘,意在渲染鸂鸟翎翼之华美,故此类金饰片存世数量众多。以规格如此巨大的成对金鸂展布于棺椁之上,可以想见墓室场景之辉煌。嬴秦为鸟图腾部族,其始祖少昊即名鸂;

秦君用成对的大金鸂装饰棺椁,当基于族神崇拜的宗教意识。流失欧洲的这批金饰片,后来一部分被收回,现藏甘肃省博物馆。

青铜礼器

陵园出土青铜器数量甚多,已知有列鼎、列簋、成对的榑方壶、编钟、编铙、箭镞和各种车马器。甘肃省博物馆藏有一批残破为若干碎片的列鼎、列簋。其中鼎的残件共130余块,据铭文可知分属7个鼎体。其中最大的鼎高41厘米,口径40厘米,宽体,垂腹,口稍敛,平唇外折沿,方立耳宽厚圆角,平底微圜,三蹄足接底处较靠内,足上部出山字形扉棱。沿下饰一周凤鸟形含目窃曲纹,腹饰三排相错的垂式重鳞纹,颈、腹间以两道凸弦纹相隔。耳部饰长短相间的唇形重环纹。足部饰以扉棱为鼻脊的兽面纹。纹下凸起来箍一道。腹内壁铭文两行6字:“秦公作铸用鼎”,铭文刻作。此鼎形制、纹饰和铭文,都较多地保留着西周后期风格,但制作相对来说较粗糙,表明秦国青铜工艺此时尚处于向周人学习的阶段。

上海博物馆藏有购自香港古玩坊肆的大堡子山所出列鼎4件(皆有铭)和列簋3件(2件有铭)。这批器物保存十分完整。其中一簋,高23.5厘米,口径18.8厘米。夔口,盖高高大,盖沿坡度较陡,龙首耳丰伟有方珥,圈足下附3个卷角兽首支足,虎爪状趾。盖顶提手内饰变形凤纹,盖坡沿与器口沿饰双凤首套合式窃曲纹,间隔浮雕小兽面牺首。盖沿8牺首向下,器沿6牺首向上,合盖后上下牺首正可两两相对,平添许多趣味,可谓匠心巧运。盖面与器腹饰瓦棱纹,圈足一周饰垂式重鳞纹。盖内与器内对铭两行5字:“秦公作宝簋”,铭文铸作,“秦”字含白。

上海博物馆还收藏有从大堡子山传出的一对榑方壶中的一只。大圈顶盖,长颈,垂腹,宽边圈足,环形螺角兽首耳。盖圈顶内饰交蟠双首龙纹,盖沿饰凤鸟形含目窃曲

纹,颈饰宽波带纹,波谷间为简化兽面纹,腹饰双躯共首的大蟠龙纹,颈、腹间以3道凸弦纹相隔。形制、纹饰与出现在纽约的一对铭文为“秦公作铸罍壶”的榑方壶近似。

综观大堡子山秦陵所出青铜礼器可以发现,窃曲纹的地位已明显上升,且皆以凤鸟为母形。虽有简繁之别,有对称与不对称之分,但均以突出的凤目为构图中心。这种现象也当与嬴秦族的鸟图腾崇拜有关。铭文字体与西周晚期的《虢季子白盘铭》一脉相承而更加规整秀美,字态圆匀,笔路通畅,已开始显露秦字齐正劲秀的气质,可视作西周金文稳定发展的正宗主流。

青铜乐器

嬴秦族有悠久的音乐传统,传世或新中国成立后出土秦器中乐器的数量和质量均引人注目。如宋代即有著录的恒公时的秦公钟,宝鸡太公庙出土的武公时的秦公钟、铙,凤翔一号大墓所出景公时的有铭石磬等,都是高雅、精美的重器。

上海博物馆所藏的秦公钟,被认为可能与该馆所藏铭文秦字省白的秦公鼎同出一墓。通高38.5厘米,铣间距24.5厘米,鼓间距20.5厘米。平于,椭圆口,舞面封实,器身略呈立鼓形。4条透雕扁连环龙纹扉棱均分器身,透雕扁龙纹繁组与两条侧扉棱相连。顶端饰昂首翘尾的凤鸟。舞部饰对称的4组龙纹。被扉棱分为4区的器表也各饰繁复的龙纹,上下各有一周绊带。鼓部中央两行7字铭:“秦公作铸口口钟”,字画纤细。大堡子山秦陵所出钟在日本和中国台湾均有收藏,形制、纹饰同而规格有别,故此钟实为编钟中的一件。中字形大墓(M2)清理出盗余的石磬8件,从石质判断应分属两套。礼县博物馆收藏了其中3件,最大者长达89.2厘米。其中一件石磬长38.3厘米,股端宽12厘米,鼓端宽9.3厘米,孔径2.1厘米,厚3.3厘米。上端为折矩状,下端略呈弧形,股部与鼓部间有正圆形穿孔。青白色大理石质地,各种比例基本符合《考工记》所言

制磬标准。造型规整,石面润洁,色调柔和,发音清越,为同期磬中佳品。

大堡子山秦陵所出编钟、编铙和编磬,不仅展示了墓葬的性质和级别,加深了我们对嬴秦音乐传统和音乐艺术发展高度的认识,也为我国古代乐器史增添了一份珍贵的实物资料。

青铜车马部件

嬴秦族不仅善于畜马,更善于御车。其先祖夏末商初的费昌,商前期的中衍,分族首领西周时的造父,都以御术高超而显名于世。《诗经·秦风》以及被公认为是春秋时期秦国文献的《石鼓文》,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对车马构件的描述和对娴熟御术的赞美。正因为嬴秦有擅长驭马驾车的传统,所以秦国贵族墓葬附车马坑的风习相当流行。

大堡子山秦陵两座车马坑只清理了一座,盗后残迹表明原葬车马4排,每排3乘,每乘两骖两服,共12辆车、48匹马。估计另一座车马坑规格与此相当。甘肃省博物馆收藏有一套车轮要件害辖,来自大堡子山秦陵。害长13.2厘米,口径5.5厘米,辖长11.2厘米。害为圆筒式,接轂部略粗,外端平面封闭。中部两周凸弦纹间夹一周绳纹,贯辖一侧素面,外侧饰蟠螭纹,端沿饰一周横式重鳞纹,封闭圆面饰凤鸟纹。辖为扁长条形,尾端斜角,贯害、轴后外露。销辖铸高双角兽首,兽首耳后有供系索防脱落的横穿孔。

礼县博物馆收藏了一对马镳。镳长11.2厘米,两端反向弯曲,上端圆弧,下端平齐,背面两端各有贯系之钮。镳正面饰两排长短相间的口唇形重环纹,斜平一端饰虎面纹,圆弧一端饰凤首纹。与西周车马器相比,大堡子山秦陵所出车马器的铸造,在注意坚固精美的同时,更加轻便实用,纹饰也有自己的特色,和嬴秦优秀的用车传统相适应。



垂鳞纹秦公鼎及铭文



瓦棱纹秦公簋及铭文



口唇纹羽瓣形金饰片和云纹圭形金饰片



风、虎、重环纹铉

(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,选自图录《秦西垂陵区》)